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國興

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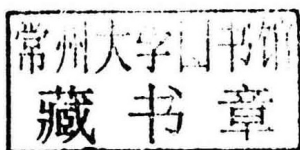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GUO XUE

國學

第四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國學·第四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館主辦.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220-10243-1

I. ①國… II. ①四…②四… III. ①國學—文集
IV. ①Z126. 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74265 號

GUOXUE

國 學 (第四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主辦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封面設計
技術設計
責任校對
責任印製

謝 雪
張迪茗
戴雨虹
藍 海
李 劍

出版發行
網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眾號
發行部業務電話
防盜版舉報電話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插 頁
印 張
字 數
版 次
印 次
印 數
書 號
定 價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勝翔數碼印務設計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185mm×260mm
3
37
620 千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1300 冊
ISBN 978-7-220-10243-1
76.00 圓

■ 版權所有 · 侵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電話: (028) 86259453

文史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
載體，浩瀚無涯。下定決心，廣佔
語料，登高望遠，探幽鉤玄，日就
月將，廬山真面目可窺見也。

向熹

二〇一六·四月
成都鳳雨居

厚積為發
孫以昭

安徽大學教授孫以昭先生題詞

CONTENTS

A Brief on Song Academic Learning	Sun Yizhao
An Era of Truth Seeking—Skeptical Tendency on Classical Ideas and the starting of Textural Research in North Song Dynasty	Xie Taofang
Confucianism Discrimination	Zeng Zaozhuang
Chesiguo's History in Han Dynasty	Chen Jun
Birth places of <i>The Book of Songs</i> in Literature Perspective	Deng Wen
Sima Xiangru and His Tutors	Cao Pengcheng
An Exegetical Study on “Mian” and “Can”	Ji Guotai
A New Discovery of Zhou Yong's Death Year	Xie Wenxue
Researches on Wei Zhuang's Birth Year	Yang Weili
The significance of Yi Xuan's Way of Spreading Buddhist Scripture	Liu Changdong
Changing Images from Ghosts' Mother to Baby-sending Goddess of Mercy	Du Yangguang
<i>Entering Medical Mirror</i> and Taoist View of Life	Zhang Zhixuan
Wemojie's Image in the Original Buddhist Scripture	Du Weiqian
A speaking-singing Way of Spreading Buddhist Scripture	Huang Huanping
A Diverted Tale about the Prince in Dunhuang Documents	Liu Qiulan
Zhang Yichao's Humble Birth and His Worship to Buddhism after joining the Guiyi Regime	Zhang Xinghua

WangShenzhong's Remarks on *Collected Poems by Du Fu* Were Actually

Done by Zheng Shanfu Wang Yanfei

Mistaken Names of People and Places in *Former Records of Tang Dynasty*

..... Zuo Hanlin

Reminding Lines' Creation and Its Prosperity in North Song Dynasty

..... Wang Zhuying

Su Shi inQingshen County and His First Marriage Zhou Yunrong

Four Passages on *Blue Cock's Chat* Peng Donghuan Wang Yingjue

LiuCenwong's Remarks on Wang Anshi's Poems Jiao Yinting

Changed Category of *Women's Guidance* in *The Four-division of Books*

..... Guo Tian

Imperial Seals on *North-prin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in Ming Dynasty

..... Long Darui

Amendments to ZhuYizun's Chronology Zhang Zongyou

ZhangZhidong and Sichuanese Education Wei Hongling

Family 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he Southwest in Ching Dynasty Xu Yanping

Historical Changes ofFongdu's Ghosts Town Chen Shisong

Learning in Yanjing University Qin Chuan

A Memorial to Wang Li at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Xiang Xi

It's My Own Choic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Zhang Bangwei

(目錄英譯 郭一丹)

目 錄

宋學簡論	孫以昭 (001)
中國學術的求真時代——北宋的疑古思潮與考據學的興起	謝桃坊 (023)
儒學辨偽	曾棗莊 (049)
漢代車師國史表（前 108～191）	陳 君 (076)
中國文學版圖視閫下的《詩經》創作地域考察	鄧 穩 (100)
司馬相如師承問題略考	曹鵬程 (116)
《說文》“蝻”“蟞”解詁——兼議蜀方言三種昆蟲的得名	紀國泰 (121)
周顒生卒年新考	謝文學 (133)
韋莊生年考辨	楊偉立 (144)
試探臨濟義玄傳法手段之意義——以異僧佐贊與棒喝接引為例 ...	劉長東 (154)
從鬼子母到送子觀音的圖像學演變	杜陽光 (186)
口訣體《入藥鏡》及其道教生命觀	張芷萱 (195)
佛經原典中的維摩詰形象研究	杜維茜 (212)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講唱情形考	黃喚平 (243)
敦煌文獻中太子成道故事變文寫本叙錄	劉秋蘭 (257)
張議潮的平民出身與歸義軍政權的崇佛研究	張興華 (290)
五家評本《杜工部集》王慎中批語實為鄭善夫批語考	王燕飛 (321)
中華書局本《舊唐書》人名地名辨誤	左漢林 (336)
北宋題跋文創作概況與興盛原因探討	王祝英 (344)
蘇軾與青神王氏家族姻親關係初考	周雲容 (362)
《碧雞漫志》四劄	彭東煥 王映珏 (371)

劉辰翁評點王安石詩歌輯錄	焦印亭 (390)
女訓書在四部分類中目錄歸屬的變化	郭 焜 (411)
《永樂北藏》之皇家印章介紹	龍達瑞 (422)
朱彝尊年譜訂補	張宗友 (435)
張之洞與四川教育	魏紅翎 (448)
清代西南地區家集提要	徐雁平 (465)
豐都鬼城流變考	陳世松 (511)
燕園求學記	秦 川 (533)
王力先生逝世三十年祭	向 熹 (539)
研習宋史：我的自主選擇	張邦煒 (562)

宋學簡論

宋學的起始

宋學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支突起異軍，是變古派。因為無論是注重微言大義的西漢今文學派，還是注重訓詁考證的東漢古文學派，都很講究學術源流和師承，有所謂“師法”“家法”之說，唐代雖也有少數經學家不因注迷經、因疏迷注，然而經學的主流為義疏之學，它仍是古文學派的支流。及至宋代，經學則一反漢學的師承和訓詁傳統，大膽懷疑，拋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求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由於宋儒治經多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故又稱“理學”。又因它以繼承孔孟道統自居，亦稱“道學”。一般就經學而論，稱“宋學”，自哲學而言，稱“理學”。儒家首先談性命關係的是子思，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對子思的學說加以闡發，因此儒學中有思孟一派。宋學從思想淵源來說，它繼承了儒學思孟學派的學說，但它又受有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尤其是佛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給予了不小的刺激，因此宋學的建立，實是以儒學倫理思想為核心，而又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

宋學的興起，有以下幾點原因。從政治上看，自唐代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長期處於割據、分裂和混戰的局面，倫理關係尤其是君臣一倫完全被破壞，宋王朝要想鞏固自己的政權，需要建立嚴格的儒家的綱常倫理和一套社會哲學理論來維繫和強化封建統治，因而極其尊崇經學。趙匡胤不但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親自為孔子、顏淵撰寫贊詞，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而且自己還喜歡讀儒家經典，手不釋卷，他的宰相趙普還是個“論語通”。因此宋學雖然高談心、性、理、

氣，但重點還是在倫常方面。從宗教文化方面看，魏晉以來，佛教盛行，文人士大夫頗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雖然佛教思想有麻醉性，統治者也需要它；但是講出家，背君棄父，又同儒家的倫理綱常發生矛盾，因此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在借助經學來重整綱常倫理時，也必然和必須要對佛教思想的有用成分加以吸收和改造，宋學高談的心、性，其中就有很大的佛教禁欲主義成分。道學思想當然也給宋學的興起助了一臂之力。雖然張載、程頤、朱熹都曾批評過莊子，但是莊子的有關思想和提法都曾被他們利用和改造，莊子在《大宗師》中描述真人的神通，要求人們摒除物欲回歸自然，從而達到“無己”的“絕對自由”境界時說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就被利用改造為“明天理，滅人性”的思想而大得程頤的稱贊。從經學本身看，漢學從西漢末年的今文、古文之爭到西晉時的鄭學、王學之辯，到南北朝時的南學北學之分，已逐漸由思想的闡發流入於語言文字的訓詁，及至隋唐，義疏派實乃古文派之支流，其研究領域已愈趨窄隘，無可發展，而進入末路，士大夫中的才識之士自不得不別求途徑，以與佛道結合的方式重新激起思想的火花。宋學的起始，其遠源除了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外還有韓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其弟子李翱的《復性書》以及韓、李的《論語筆解》，其近緒則是劉敞的《七經小傳》、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歐陽修的《毛詩本義》和《易童子問》，而“宋初三先生”之說則是其椎輪和雛形了。

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研究開啟了宋學捨傳求經、大膽懷疑、探求本源的風氣，韓愈、李翱等則主要是通過“道”與“性”的研究，提倡倫理綱常。韓愈的《原道》主要提出、論述與佛教、道教的“道”相對立的“道”以及與佛教祖統相抗衡的道統。認為儒教的仁義即道德，指斥釋、老之“道”“去仁與義”，“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毀滅倫理綱常。提倡“有為”，強調《大學》中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批駁釋、老的“虛無”，並且構建了堯、舜、禹、湯、武、周公、孔子至孟子的所謂“道統”。《原性》則提出“性情三品說”，認為“性”與“情”各有上中下三品，對“性”，贊揚上品而引導中品；對“情”，主張“求合其中者”，以符合封建倫理的基本原理，為封建倫理和等級制度提供理論依據。李翱的《復性書》，認為“性”和“情”（情欲）是對立的，“性”善而“情”惡。主張用“齋戒其心”的辦法去滅“情”。他所說“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此齋戒其生者也，猶未離於

靜焉”……“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這裏很明顯是儒道佛相結合，雖然要求達到的是儒家“至誠”的最高境界，是以《中庸》為根據的，但它受到莊子“心齋”“坐忘”體“道”途徑的影響與佛家“寂滅”思想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韓愈、李翱都不是經學家，但有時也講點經學。但他們同注的《論語筆解》，牽強附會之處很多，學術價值不高，如釋“宰予晝寢”，將“晝寢”說成是“晝寢”之誤，釋“六十而耳順”，認為“‘耳’當為‘爾’，猶言如此，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這些都是很難講得通的。但它對宋學疑經、改經之風，卻有先導作用，而且個別的解釋也頗有見地，如釋《論語·先進》篇“浴乎沂”之“浴”字為“沿”字之誤，就得到俞樾的肯定。

劉敞，字原父，世稱公是先生。北宋慶曆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其學識淵博，篤志經術，猶長於《春秋》學，著有《七經小傳》《春秋權衡》等。劉敞治經，與漢唐經學家依據古注對經典進行闡釋大不相同，好以己意釋經，開宋儒擺脫傳注束縛，評議漢儒的先聲。《七經小傳》（“七經”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是劉敞的代表作，也是宋學的發端作之一，其優點和特色是重義理輕注疏，發義新奇、不拘古訓。如對於《論語·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二句釋為：“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為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己者以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這裏明顯在於義理之發揮，與向之注疏迥異，就文理看，也有增字解經之嫌。劉氏於闡發義理外，有時亦兼及考證，如《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釋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舊說婦人即父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按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父母猶存乎？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始也，故得以同之亂臣。”這是好的方面。但劉氏治經，好穿鑿臆斷，甚至不惜改經。這類例子頗多，如將《尚書·無逸》“此厥不聽”作“此厥不德”，改“聽”字為“德”字，將《詩經·小雅·常棣》“烝也無戎”作“烝也無戍”，改“戎”字為“戍”字，都是明顯錯誤的例子。後世學者每致譏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便批評為：“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

王安石曾著《三經新義》，對《書》《詩》《周禮》作了新的解說，擺脫繁瑣



的訓詁，用來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熙寧變法，考試用經義論策，規定無須用《新義》之說。原書已失，清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收入《經苑》。今人邱漢生又輯校《詩義鉤沉》一冊，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從上述二書中看，王氏藉經義以重事功、正法度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他在《周官新義》中說：“天地四時之官，各以象類名之，其義甚衆，非言之所能盡，觀乎天地四時，則知名官之意矣。蓋治所不能及，然後教；教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所不能勝，則有事焉；刑之而能勝，則無事矣，事終則有始，不可窮也，故以邦事終焉。”於《詩》，則認為：“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為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為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禮天子諸侯，位雖有殊，語其善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為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為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勸焉。”（《臨川先生文集·臨川集補遺》）另外，《周官新義》還附會《周禮》經義，提出理財、整軍等改革。其訓詁亦時有割裂經義、牽強附會之處。

劉敞的《七經小傳》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對宋學疑經之風的真正形成影響較大，王應麟在《困學紀聞·經說》中說：“《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事實上宋儒第一個突破舊唐注疏束縛，大膽辨偽糾謬，發抒己見，從而開創了宋學疑古惑經，闡發義理的時代風氣的是歐陽修，他的《毛詩本義》問世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其子在《先公事略》中說：“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未有說者……其於《詩》《易》多所發明。”歐陽修主張，《詩經》研究應以探求《詩》之本義為宗旨，要從蕪雜的漢唐注疏中解脫出來，直接從《詩》之原文出發，還詩人作詩、“聖人”定詩的本來面目。他辨詰毛、鄭，對毛《傳》、鄭《箋》脫離《詩經》原文的“臆說”“衍說”“妄說”“曲說”，予以批評。他指出應該“必因其信，據其義以為說”，否則便是“臆說”（《詩本義》卷八《何人斯論》），而毛、鄭之失就在於“以衍說害義”（《詩本義》卷一三《一義解》），“妄意詩人而委屈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詩本義》卷一二《有駘論》）如《詩·風·靜女》，他認為是“情詩”，“據

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彷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貞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捨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耳”。這是很有見地的。尤為難得的是，他還反對改字釋經，這在宋學中可稱絕無僅有。另外，歐陽修的易學著作除了著名的《易童子問》外，還有《易或問》《明用》《張令注周易序》《傳易圖序》《送王陶序》（一作《剛說》）、《繫辭說》多種。概括而言，其中表現了主張義理的易學傾向，而反對卜筮，反對河圖洛書，也反對以心性說《易》，認為《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強調《易》主於明人事，與天道無關。歐陽修在易學疑古之風方面也有開啟之功，但他反對河圖洛書卻並不正確。^①

“宋初三先生”指胡瑗、孫復、石介三人。胡瑗，字翼之，因世居陝西路的安定堡，學者稱安定先生。他和孫復、石介“以仁義禮樂為學”，曾於蘇、湖二州主教二十餘年，從學者甚眾，程頤亦出其門下。講“明體達用之學”，“體”是封建道德的準則，“用”為準則的應用，注重封建道德的體用結合。對性與命亦有所闡述，認為：“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在天者順之。”（《論語說》）開宋儒性命之學的先聲。孫復，字明復。曾舉進士不第，退隱泰山，聚徒講學，世稱泰山先生。以講《春秋》著稱，提出“尊王”為本，著《春秋尊王發微》，認為孔子著《春秋》之目的在於“尊王”，對擅專的諸侯“正以王法”。又著《睢陽子集》，推尊儒家道統人物，謂自漢至唐，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乃“始終仁義，不叛不雜”，使“聖道晦而復明”。反對佛、老“虛無報應之事”和“去君臣之禮”。石介，字守道。因隱居徂徠，世稱“徂徠先生”。官至太子中允。長期從事教育，門人眾多。著有《石守道先生集》《徂徠集》。從儒家立場出發反對佛、老，標榜王權，為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論據。所作《辨惑論》，指斥佛、老，謂“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並對宋初的浮華文風進行了抨擊。三人之中，胡瑗、孫復之影響尤大，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叙錄》中對他們的學術個性作了評價與說明：“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二先生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而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又說：“泰山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

^① 關於“河圖洛書”的重新評價，可參看《易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千古〈河圖〉與八卦關係的解釋》，載《光明日報》1996年11月20日。

宋學的主幹

宋學的主幹是“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閩”（朱熹）四派。而閩派朱熹是宋學（即“理學”）的集大成者。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曾官郴州郴縣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等。因其築室於廬山蓮花峰下十溪旁，以營道故居之濂溪名其堂，故學者又稱“濂溪先生”。後追謚元公。周敦頤的主要著作是《太極圖說》和《通書》。《太極圖說》中“說”的部分，雖只有二百五十餘字，但卻很重要，它言簡意賅援道入儒，依據陰陽之學的原理，提出與闡發了一個與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論，使之成為宋學（即“理學”）的經典文獻，周氏也就成為了宋學的開山人物。其文甚短，全引如下：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度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度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說”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言“太極”，第二層論“人極”，最後一層引《周易·說卦》之文，以“大哉《易》也”作結，說明《太極圖說》的思想是完全以《周易》為依據的。周“說”的理論意義和價值有以下幾點：一是它與佛教的勢力自南北朝迅速擴大，以其特有的精微的思辨哲學和心性論向道學、儒學挑

戰有關。如唐代華嚴宗大師宗密在《原人論》中就指斥儒、道二教以元氣爲本原的思想實爲淺薄，比不上佛教以本覺真心爲本原的思想，應用佛教來取代二教，說什麼“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原，則佛教方爲決了”，“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察粗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返照心原”。二是在這以前儒家研討《周易》，有的言天而不及人（如劉牧），有的言人而不及天（如李觀、歐陽修）；有的雖言及天人但是從儒家的人文主義而論（如司馬光），有的言天人則自道家的自然主義而言，只有到了周氏，纔以儒爲本，吸收道家學說，特別是《老子·二十八章》“復歸於無極”的提法，又根據宋初道士陳搏之《無極圖》，提出“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以“有生於無”的精微玄妙的思想，爲儒家建構了天人結合的宇宙論和性命論的框架結構，以與佛教抗衡。其三，我們從周氏的有關詩文著作中更可以瞭解他的以儒爲本而又吸收佛、老的事實。其《讀英真君丹訣》：“始信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處更知微。”“希夷”乃陳搏的賜號，這說明周氏易學與道教有深厚的淵源。其題《大顛壁》：“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說明他不贊成韓愈之排佛，而主張對佛教應有所瞭解。他的《養心亭說》一文，更公然批評孟子關於“養心莫善於寡欲”的說法，而認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這無疑是吸收了佛教心性修養中的“無欲”主張。他還常與高僧道人爲友，流連於山巔水涯間（見其內兄蒲宗孟《周敦頤墓碣銘》）。再聯繫周氏所說“一部《法華經》，只有一個‘艮’卦可了”（《二程外書》卷一〇），可以充分說明周敦頤的以儒爲本，廣泛吸收佛、老的本色，也充分說明宋學本身實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而又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的這一客觀的宏觀事實。

《通書》原名《易通》，一稱《周子通書》。全書共四十章，雖論述了多方面的問題，但主旨在於闡發其《太極圖說》的中心論點，論述由太極以立人極的思路，使其天道性命之學成爲完整的體系。首二章《誠上》《誠下》爲全書的總綱，而其基本思路與手法則是以《中庸》爲體，《周易》爲用，以《易》證《庸》。《中庸》曾把“誠”提高到天人關係的哲理高度來進行闡述，指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但是，這種闡述過於簡單，未作具體論證，使人不明天道何由具有倫理的性質而又以誠爲本的問題。而《通書》則對之作了簡明扼要的闡述與論證，首章以“誠”爲至人之本，純粹至善，而又引《易》以明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乃“誠”之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是“誠”之所由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就由天道而言及人性，並以“元亨”為“誠”之通，“利貞”為“誠”之復，最後結以“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說明“誠”為“乾”，“乾”為天道，“誠”亦為天道。這裏主要言天，由天而及人。第二章則說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說“誠則無事矣”。主要言人。這就溝通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關係，通過對“誠”的闡述與演繹，為儒家的道德本體論確立了天道自然的哲理基礎，對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了哲學論證。自此之後，理學家言性命必上溯天道，而言天道則必下及於生命，這一理論基礎實自周敦頤始。另外，周氏還把《周易·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物咸寧”的“太和”這一天人關係最高層次的和諧加以具體闡釋，他在《樂上》中認為：“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這是說的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在《樂中》內又說：“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這裏又就宇宙自然的和諧而言。這種以天人整體價值觀念以言“太和”的思想與提法，對以後的理學家和一些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影響，張載、朱熹乃至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都曾用以表達思想，闡述問題，雖具體所指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並無二致。張載著《正蒙》更以《太和》開篇，並進一步認為“太和”即是“太極”，這無疑是受了周氏的啟示，周敦頤實為理學的開山祖師。

程顥、程頤是兄弟，世稱“大程子”“小程子”，學於周敦頤，合稱“二程先生”。程氏世居中山，後徙河南，故二程為河南人。因二程兄弟長期居洛陽講學，故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同為理學奠基人。

程顥（1032～1085），字伯淳，童年誦詩書，強記過人。曾任鄆縣、上元縣主簿、晉城令，有治績，重教化。宋神宗時，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每召見，務以誠意感動神宗。王安石雖與之議論不合，亦嘗愧服。後出知扶溝縣，又被貶至汝州為酒監。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僅五十四歲，文彥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追謚純公。程頤（1033～1107），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遊太學時已為胡安定所特契。哲宗時，官至崇政殿說書，頗多匡正，而議論褒貶無所避忌。反對王安石新政，被列為奸黨，屢被劾，削籍貶至四川涪州，年七十五卒於洛陽。卒後追謚正公，學者稱“伊川先生”。二程